

容闳作为边缘人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学理考察

王忠萍

(徐州师范大学 教务处, 江苏 徐州 221116)

[关键词] 容闳; 边缘人; 介入; 晚清主流社会

[摘要] 容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贡献是以其介入主流社会为前提的。容闳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历程充满坎坷, 虽有局部的成功, 但总体上是失败的。他介入晚清社会的动机、行为和方式贯穿了传统与新知的矛盾, 体现出本土文化与西洋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较量。容闳一直“借力”谋求报国的理想, 虽取得部分的成功, 但他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断裂”又终究使他成为失败的悲剧人物。容闳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曲折历程, 正是近代中国的众多留学生归国后社会经历的缩影。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07)06-0001-06

容闳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曲折历程, 自始至终体现了他的边缘人的身份, 这颇具典型意义。本文确认容闳具有晚清社会边缘人的身份, 拟运用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 侧重于分析容闳努力介入晚清主流社会中的心理动机和行为方式, 凸显其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成败及其与社会条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容闳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过程, 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亦折射出其主观动机和行为方式, 由此也显现出其边缘人的显著特征。传统与新知的矛盾在容闳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过程中有着特别的体现, 也影响着容闳主观动机的实现与行为方式的采取。因此, 在分析容闳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动机和行为方式时, 不能不涉及近代中国的传统因素和容闳所受西学新知所构成的影响。

容闳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动机颇有特别的地方,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西学东渐的终生期待。容闳积极致力于西学东渐的事业, 认识到知识的力量和社会意义, 强调“知识即势力也”^{[1] 167}, 认为美国的富饶是因为有其先进的教育和不断增长的知识。容闳目睹美国的繁荣并立下了西学东渐的誓言: “予意以为,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 则当使后予之人, 亦

享此同等之利益, 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中国, 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1] 162}。这样, 他回国后的种种努力都力求完成其“西学东渐”愿望, 试图寻找到机会实施其留学教育计划, 以达到用西方的学术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使中国强大的理想。因此, 当容闳的留学计划中途终止后, 容闳即认为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甚至是终身理想受到“摧残”, 由此也使容闳在心理上极度悲伤和痛苦。容闳自述当时的心情是: “自 1880 年到 1886 年, 为余生最不幸的时期。毕业志愿, 既横被摧残(指教育计划); 同命之人, 复无端夭折。顿觉心灰, 无复生趣。”^{[1] 147}把教育计划的失败看成与丧失亲人同样的悲愤, 由此可知西学东渐的理想确是容闳终生的期待和追求。

2. 少年中国理想的精神诉求。改变中华传统而创造新生的“少年中国”, 是容闳人生的理想信念。当容闳留学美国期间, 他就感受到美国社会蒸蒸日上的活力, 认识到美国的兴盛是与教育的发达分不开的。回国以后, 容闳提出改造中国的教育计划, 认为“教育计划果得实行, 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 必可使老大帝国, 变而为少年新中国”^{[1] 124}。在处理天津教案时, 容闳又将“少年中国”的期待与政治变革联系起来, 他感慨教案“是因仇教之恶果, 而转得维新之善因, 在中国国家未始非塞翁失马, 因祸得福”^{[1] 124}。

[收稿日期] 2006-10-21

[作者简介] 王忠萍(1968—), 女, 江苏盐城人, 徐州师范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 历史学硕士。

容闳主张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抓住时机,积极维新,使中国充满活力,把老大帝国变为少年中国,体现的是他追求少年中国的理想和变革中国的强烈愿望。

3 展示自我价值的心理需求。作为很早就受到完全西学教育的中国人,容闳有着强烈的展示自我人生价值的心理需求。纵观容闳的一生,他总想着把自己平生所学贡献于祖国,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在论及“知识越多越痛苦”的苦乐观时,他认为:“持此观念论人生之苦乐,则其所见亦甚卑,惟怯懦者为之耳。此其人必不足以成就伟大之事业,而趋于高尚之境域也……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1] P62}。容闳苦的是所学无以为用,乐的是用平生所学造福于祖国和人民,这是容闳对自我价值的高度提炼。为此,容闳一生中多次变换职业,积极结交社会名流,采用种种途径介入主流社会,以寻觅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

4 “有益于中国”的人生愿望。容闳在留美期间就立下了宏愿:“他日竞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事,以竞吾志。”^{[1] P58}容闳虽然对归国后的困难早就有所预料,但是他认为回国效力是最有益于祖国的。“选择最有益于中国者”就成为容闳一生中的最大的愿望,因此容闳一生多次变换工作,寻求助力,如派克公使、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等都成为其追寻的人物。正是因为容闳以“有益于中国”为行为标准,即使生活在美国期间,他在心理一天也没有放下祖国。当甲午战争发生后,他立即通过好友蔡锡勇向祖国提出了银行计划、铁路计划和借款计划等。也正如此,容闳在认清了清朝的政治腐败之极、无药可救时,毅然向孙中山提出“中国红龙计划”;而在自己病重不能成行时,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国,效力新生的中华民国。“有益于中国”一语是容闳一生“义无反顾的爱国主义精神”^{[2] P2}的写照,同时也折射出容闳一生深沉持久的心理愿望和人生理念。

容闳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行为开始于他回国之后。起初,容闳对祖国已经完全隔膜,不会讲汉语,完全是一个长着中国人模样的“洋鬼子”。对他来说,中国反倒像异乡,在中国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3] P165}。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容闳

开始了他艰难曲折的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奋斗历程。其行为方式主要是:

1 主动本土化。多年的西学教育与熏陶,使得容闳从衣着打扮、言谈举止到内在思想上都俨然一名“外国人”。因此容闳要介入中国社会,让国人接纳他、认可他,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积极本土化,以便获取国人的认同。于是,容闳在母亲的建议下剃去胡须,换上汉服,使自己从外表上与国人一致;在汉语几乎忘光的情况下,开始跟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字”^{[4] P3}。容闳学习汉语非常认真,“他足足花了两年,什么都不干,下工夫熟练汉语”^{[3] P166},同时,学习国人交往、处事的规则。容闳这些努力,是一种积极的本土化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使得国人增加对他的认同。

2 谋食亦谋道。当容闳“语言渐复旧观,谈话无虞扞路”时^{[1] P70},他便开始寻求职业,解决吃饭问题。容闳在“谋食”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而是把“谋食”与“谋道”结合起来。容闳首先到广州当派克公使的书记,“欲藉派克力识中国达官,庶幾得行予志”^{[1] P71}。其后,容闳发现此职与他的“计划甚左”后,立刻辞职到香港学律师。继而,容闳又认为“久居英国殖民地,身体为所拘束,不能至中国内地与上流社会交游”^{[1] P72},亦即不能实现“谋道”的目的。这样,容闳于1856年8月在上海开始译书工作,他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译书工作:“纵不得多金,因大可藉此以多识商学界上流人物,推广交游,以遂予之第一目的。”^{[1] P78}容闳在译书过程中结交了一批懂西学的知识分子,后来正是靠这些朋友的帮助,容闳又结识了对他的事业帮助最大的洋务重臣曾国藩。可见,容闳把“谋食”与“谋道”贯穿在择业过程的始终。

3 寻找新的机缘。容闳曾于1860年造访太平天国,目的是通过考察了解太平天国的实情,寻求实现理想的支撑点。容闳向太平天国提出了七条建议,但并未得到洪仁玕的真正重视,他由此也认识到太平天国不能振兴中国,“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1] P100}经过这番实地考察,容闳断绝了以“太平天国维新中国”的念头。这样,容闳要实现报国的的心愿,只得在晚清权力结构中寻找新的机缘。1863年容闳通过朋友结识了曾国藩,在得知曾国藩欲问及办理“西式机器”之事时,容闳遂以设立制造机器的母厂为建议,而将时刻悬于心中的“留学计划”暂时束之高阁。容闳认为:“今既明

知总督有建立机器厂之意，且以予今日所处之地位，与总督无旧交，不过承友人介绍而来，此与予个人营业时，情势略有不同，若贸然提议予之教育计划，以显冒昧。”^{[1] P111}正因为容闳了解曾国藩心态，才使得他获得了新的机缘，其计划也因洋务派的支持而有部分的成功。

容闳介入主流社会的动机及行为方式，概而言之，有这样几点：

一是认同和遵守现行的社会秩序。容闳回国后所面对的是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社会，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承认当时的社会现实，认同清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遵守当时的社会秩序，然后才有可能介入到主流社会而谋求自己的发展。在谋求职业时，容闳首先想到的也是能与晚清的“上流社会交游”，承认既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虽然他曾察访太平天国，与干王洪仁玕交谈并提出七项建议，但很快就离开了太平天国而另谋出路。容闳后来拜访曾国藩并提出条陈四则，向清政府提出银行和铁路等计划。这些计划，有的取得成功，有的则付水东流，但不管成功与失败，都表明容闳承认和认可清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力图在现行的社会秩序范围内有所作为。只是当容闳认为清政府腐败已极而无力回天时，才毅然抛弃自己对清政府的认同态度。后来，容闳自己说：“予之种种政策，既皆无效。于是予救助中国之心，遂迹至此而止矣。”^{[1] P154}

二是通过熟人与朋友的介绍和推荐。容闳不但遵守当时社会秩序，而且积极利用当时社会中既存的人事交往关系，力图通过熟人、朋友引荐的方式介入当时的主流社会中。容闳结识了一批新式的知识分子和热爱西学的上流社会人士，例如张斯桂、曾寄甫、李善兰、徐寿、华衡芳、丁日昌、李鸿章、曾国藩等等。在结识这些上流人士的过程中，熟人、朋友的推荐是重要的方式，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引荐容闳与曾国藩见面的是曾长期在江苏上海活动的李善兰、张斯桂；帮助容闳揣摩曾国藩心理、出谋划策的是无锡的华衡芳、徐寿；协助容闳完成‘留学计划’条陈的是一位‘南京友人’”^[5]。在译书的过程中，也正是因为有朋友的推荐，容闳才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扩大了交往的范围，并进而结识了曾国藩。容闳认为：“故予为译事三阅月，而上海之中国人，几无一不知予为美国毕业生矣。予之译事，所以能奏此成效而博此名誉者，皆予友曾寄甫之力也……曾君后又介予于中国之著名大算学家李君任叔，予因

李君又得识曾公国藩。”^{[1] P79}

三是主动向当权者宣传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容闳在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过程中，还积极地“自荐”，采用了向当权者宣传自己见解和主张的方式。容闳不断地提出种种计划和办法，寻求合适的机会向丁日昌、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人物做宣传，以获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容闳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一方面因为容闳是西式知识分子，这种办法更易为容闳所采取；另一方面因为容闳的中学功底不深，在这个科举功名、世袭爵位仍是介入权力中心的主要方式的社会里，他无法凭借传统的资源而获得上流社会的认同。在绝大多数人还采用传统方式介入主流社会时，容闳已经开始探索介入社会的新方式。

容闳介入主流社会的动机是强烈的，介入的行为方式不仅积极而且多样化，并显现出传统式介入方式与西方式介入方式相结合的特色。由此也不难看出，容闳边缘人的身份伴随其介入主流社会的行为方式的始终。

二

容闳介入中国主流社会的努力，是成功还是失败呢？从表面看来是失败的，因为容闳最终没有成为晚清主流社会的一员，而只是晚清社会的“边缘人”（边缘人）临终也未能返回故土。但辩证地说，容闳介入中国主流社会的努力，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其依据是：

第一，促成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江南制造局及附属兵工学校的建立。1863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计划建一“西式机器厂”，需要向欧美购买机器设备，容闳因通晓西学而成为办理购买机器设备事宜的合适人选。在李善兰、华衡芳等的推荐下，容闳拜见了曾国藩，并建议首先建立生产机器的母厂，“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1] P111}。后来容闳成功地购买了美式设备，并于1865—1867年建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在容闳的建议下，“江南制造局”还附设了“兵工学校”，专门培养本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容闳也因此获得了五品实官，以候补同知在江苏任翻译。这样，容闳成为晚清社会的一名官吏，初步介入到清末的主流社会中。

第二，首开晚清官费留学教育之先河。容闳认为，国家强大的重要条件是发展留学教育，培养通晓西学的人才。在江南制造局附属兵工学校成立时，容闳的教育计划已经“小试其锋”。经过容

阎和洋务大臣丁日昌、李鸿章、曾国藩等的多年努力，清政府终于采纳建议，同意在上海设立“留学肄业局”，每年派 30 名幼童（12—14 岁）留学美国，四年共计派出 120 人，费用由海关拨出。1872—1875 年，120 名幼童分四批留学美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容闳本人也被任命为留学生监督和驻美副公使^[6]。这是容闳的西学东渐、富强中国理想的一次成功实践。留美幼童后来成为晚清社会首批较全面懂得西学的人才，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容闳首开了晚清官费留学教育之先河，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留学生之父”。

然而，容闳介入主流社会的努力，从总体上来说是不成功的：容闳最终仍然没有脱离既定的“边缘人”身份。

容闳虽通晓西学，但对儒家文化相当陌生，始终未能融入儒家文化体系之中。在容闳生命的 84 年历程中，在西方文化的环境里生活了约 50 年，只有 30 年左右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度过的。尤其重要的是，容闳从 7 岁开始接受了约 17 年的西式教育，形成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因而，容闳对自己祖国的文化已经相当陌生，虽有满腔的报国之心，但也无法找到改革传统文化的策略。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分析，容闳既不属于下层的工人农民，不可能与工人农民建立某种联系；又不属于晚清社会阶级结构的中上层，尤其是与中上层社会士大夫、官僚阶层有很大的距离。因而尽管洋务派在兴办洋务时不得不借用通晓西学的容闳，但容闳并不能真正成为洋务派的中坚分子。晚清社会当权者，大都把容闳看成是“洋鬼子”的象征，这注定了容闳在介入中国主流社会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艰难和曲折。

容闳首开留学教育之先河，固然显现出介入主流社会的部分成功，然而他的各项救国之策均未完整实施，没有能得到主流社会的积极认同。容闳提出了留学教育计划、银行计划、上海轮船公司计划、铁路计划、借款计划等等，其中得到政府承认是极为有限的。譬如，容闳 1869 年前后建议曾国藩在上海筹建华商汽船公司，但曾国藩对容闳持不信任态度，结果华商轮船公司未能问世，而三年后由李鸿章掌握大权的轮船公司却诞生了。获容闳很高评价的曾国藩尚且如此，何谈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之流。又譬如，容闳的国家银行计划因暗箱操作而由盛宣怀经营，铁路计划、借款计划未得到张之洞等洋务派的支持而束之高阁。在

晚清社会，懂西学的容闳不被重用，他提出的种种计划大多得不到具体落实。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容闳并未能够真正地介入晚清主流社会中。

容闳为实现自己的主张矢志努力，但最终仍然逸出了晚清主流社会。容闳志向高远，归国后即试图结识权贵和名流，以竟其志。他做过文书，翻译过书籍，甚至还有短暂的经商经历，但他始终考虑的是如何以自己所学来贡献祖国。他曾这样表明心迹：“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啜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收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1] P24}。容闳虽“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但在留学计划无端失败、妻子重病的严重打击下，他终于心灰意冷，从此“无论故国发生怎样急切的召唤，他也决计不离开家门一步”^{[7] P385}，在极度的悲伤中决心终生放弃介入中国主流社会的努力。此后的 13 年，容闳一直居住于美国。容闳最终逸出晚清主流社会，他的努力以失败为结局。

三

容闳介入主流社会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与当时的社会情形、个人的努力状况自有密切的因缘关系。下面从总体上剖析容闳介入主流社会成败的主因和次因，以求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及容闳介入主流社会的行为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影响容闳介入主流社会成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世界形势和晚清的社会条件，同时也是与容闳个人的努力方式分不开的。就社会而言，容闳顺应、至少不违反主流社会的需求时，就会较为成功地得到晚清主流社会“借力”，故尔容闳介入晚清社会的努力可以取得部分的成功。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末，晚清社会掀起了洋务运动的热潮，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也就成为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急切需要像容闳这样懂西学的人才，而容闳正好顺应了晚清社会和洋务派的需求。洋务派就曾认为容闳是办理洋务不可多得的人才，曾国藩称容闳“庶几闳毅之选，不仅通译之材”^{[1] P119}，而且“为中国可选之材”^{[8] P265}；李鸿章也称之为“洋学及西国律法探讨颇深，洋情既熟，……其志趣尚知要好”^{[9] P34}。就容闳个人努力方面而言，他经过 8 年左右的时间对晚清社会的了解，懂得了如何采取适当的策略来赢得洋务派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容闳才能作为全权代表赴美

购买机器,促进江南制造局的建立及附属兵工学校的建立,成功地实施了幼童留美的教育计划,赴秘鲁捍卫华人的利益,为晚清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然而,容闳与晚清主流社会的磨合过程耗费了其一生的时间,但他未能介入晚清社会权力结构的核心圈,始终都未能成为晚清社会一言九鼎的重量级人物。主因仍然应在晚清社会中寻找。就当时的社会而言,当时中西交流渠道较少,仅有一些传教士及少量的开明人士在进行中外文化的交流工作,也只有几个通商口岸及中国中南部沿海的部分地区与外界发生一些交流,而晚清主流社会对域外文化的态度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当时排外主义、保守主义盛行,一些重实效的改革派受到猛烈的攻击,丁日昌、郭嵩焘等甚至因顽固分子的攻击而辞职引退,洋务运动受到的反对如此激烈以致它的失败也就不足为怪^{[10] P199-230}。容闳作为一个接受西方民主政治观念和科学知识并完全西化的现代人,与当时的晚清主流社会之间缺少交流和理解的桥梁。边缘人身份的容闳,要介入晚清主流社会以及在其中大有作为,实在是缺乏充分的社会条件。容闳拥有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识,对晚清的顽固派自然不可能产生认同感。而容闳与洋务派官僚也有很大的区别:洋务派官僚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容闳追求的是用完全的西学彻底改造中学,实现晚清的现代化。因此洋务派不会真正地信任、坚决地支持容闳,就连被容闳称为“清代第一流人物”的曾国藩也是如此,所以容闳只是洋务派所需的一名技术人员而已。容闳一腔热血、报国无门,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努力总体上失败了,这只能说容闳生不逢时,时代给这位赤子的舞台太小。

容闳介入主流社会的成败,其次因在于容闳自身。容闳介入主流社会的努力之所以能取得局部的成功,成为“留学生之父”、中国“近代化先驱”等,容闳自身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容闳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报国激情,一生追求的是西学东渐而富强中国的目标。1903年春梁启超在美国拜访过容闳,后来他作了这样一番描述:“先生今年六十七,而矍铄犹昔,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11] P34}这是对容闳赤诚爱国心的写照。二是容闳有坚忍不拔的毅力。综观容闳一生,曲折很多:得到过清政府的封官,做过非常国会的会长;也多次失业,成为大清的通缉犯;但容闳都能从困境中崛起,继续从事爱国活动。

但容闳自身的弱点也是显见的。第一,容闳的社会身份有先天的不足。容闳出身寒微,世代无官,因而在晚清这个官本位的国度里难以有传统官场的社会资源可利用;而且,又因为未受到中国传统权力运行规则和处事方式的熏陶,缺乏应有的交流沟通的技巧。陈兰彬、吴子登也是懂得一点西学的清朝官员,并非是完全的顽固派,但即使如此,容闳也难以与他们处理好关系。容闳没有科举功名,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的缺失使他无法与儒学大师平起平坐;随之而来的是,他对中学了解不深,不能在教育幼童时扬长避短,所以在管理幼童时未能做到中学与西学兼顾。对容闳而言,留学的经历和西学知识以及娶西方女人为妻只能增加他边缘化的程度,这使他难以顺利地介入中国主流社会。这一点,可以从同为晚清留学生的严复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奋斗历程得到印证和说明。严复出生于已经衰落的家庭,早年受过传统教育,但留学欧洲使他成为“一个西方文明的十足的崇拜者:这导致他对中国传统进行无情的批判”^{[12] P340}。无科举功名的严复无法跻身于上流社会,所以他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四次参加科举,结果却名落孙山,只是到1889年才捐得四品同知功名,1909年赐予文科进士第一名(第二名是留学欧洲精通西学的辜鸿铭)^{[13] P1-6}。虽然严复的中西学养皆属上乘,但仍然要拜桐城派儒学大师吴汝伦为师,《天演论》译成后又请其作序。相互比较可知:仅仅通西学而无中学功底与科举之名的容闳,要介入晚清主流社会中是何等的困难。

第二,容闳本人的性格特征也影响着他介入晚清社会的结果。仔细阅读《西学东渐记》,就可以知道容闳的性格特征是善交际、开朗、活泼、有领导能力,属于外向型气质。早年随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留学,后在上海痛打洋水手,太平县运茶遇盗匪能镇静机智地脱险,都表明容闳的活泼开朗、有领导能力;容闳也对自己善交际的性格有清楚的认识,“余熟悉美国情形,而与学界中交游尤广”^{[1] P61}。容闳的性格特征与中国传统的谨慎、节制、随和、中庸的特征有着本质的不同,“容闳性格中的西洋性多于中国性,这就是容闳在因循守旧的专制时代难以立足的重要原因”^{[14] P14}。而比容闳稍晚些的晚清留学生伍廷芳的性格则是属于稳定内向型,他的性格是谨慎、深思、平静、节制,所以深得李鸿章等晚清官僚的信任和重用。可以认为,容闳的性格特征影响了他被晚清社会所接

受的程度,最终也影响着他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结果。

第三,容闳始终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西学东渐的道路。对此,学者罗福惠也有类似的想法。由于容闳中学功底的欠缺,因而对祖国文化了解不深,虽然他提出了很多的设想,然而大多不免带有空想性。容闳认为要改造中国,只要把美国的模式移植进来就行。1866年于扬州译书期间,容闳认为派森的《契约论》(Parsons on Contracts)对中国很有用,可是当他请一熟悉中国政界事务的文士共译时,该文士就劝他别译此书:“纵译毕,亦恐销路不广。因在中国法庭中,因契约而兴诉讼者极少;即或有之,而违背契约之案件,亦自有中国法律可援,外国之法律,实不合于中国情势云。”^{[1] P120}也就是说,即使书译出,也无大用。1896年容闳根据他和黄开甲翻译的美国

国家银行律,制定了中国的国家银行计划,张荫桓看了他的银行计划后即认为:“其中有若干条,不合于中国国情,难期实行。”^{[1] P152}在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的执行和管理留学幼童的过程中,也大多是照搬当时美国教育和管理的范式,不可避免地脱离中国的实际。

容闳的一生充满坎坷,展示的是一位文化边缘人努力介入主流社会的动态图景,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晚清社会风气初开,确实需要如容闳这样的具有西方现代知识和民主意识的新型人才,但是,晚清社会整体上并未发生质变,容闳作为近代的新型知识分子只能成为中西文化的边缘人而报国无门了。容闳介入主流社会的历程已经成为历史,但如何拓展新知特别是发挥像容闳那样的新式人才的作用,给他们提供生活的舞台和发展的空间,却是我们今天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2] 李新. 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序一[M] / 周棉. 中国留学生大辞典.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3] 吐依曲尔. 吐依曲尔氏之演讲[M] / 走向世界丛书.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4] 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史[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
- [5] 姜新. 晚清公派留美幼童计划与江苏[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4 (2).
- [6] 陈学恂, 田正平.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卷)[Z].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 [7] 黄晓东, 刘中国. 容闳传[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3
- [8] 江世荣. 曾国藩未刊信稿[C].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9] 李鸿章. 论派员查办秘办秘鲁华工[M] /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 南京: 金陵刻本, 1905
- [10] 郝延平, 王尔敏. 中国人对西方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M] /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1]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12] 张灏. 思想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M] /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3] 欧阳哲生. 严复先生小传[M] /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14] 张礼恒. 从西方到东方: 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On Rong Hong's Interposition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a Marginal Person

WANG Zhongping

(Dean's Office,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Key Words: Rong Hong; marginal person; interposition; the mainstream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bstract: Rong Hong'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China is on the premise of interposing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His course of interposition is full of frustrations. His ending is in failure in spite of some success in parts. The conflic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s involved in his motives, actions and manners, reflecting the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Confucian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Rong Hong's success contributes to his ideal of dedication to his motherland, but the disconnection with the mainstream society makes him a failed and tragic person. Rong Hong's rough course of interposing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in late Qing Dynasty is an epitome of the returned students in modern China.

[责任编辑: 刘一兵]